

【往事】

《鹰落凉山》：揭秘抗战时期的凉山往事

看《鹰落凉山》图片展，就像读一本历史书，它不仅展现了抗战时期凉山地区的景象，也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美国战机坠落凉山的故事。通过展览，观众能够看到、感受到凉山当时的状况，尽管深处内陆，尽管封闭落后，但是凉山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 宋明

8月4日至10日，在第六届中国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期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推出了《鹰落凉山》图片展。此次展览用100多张图片、1万多字，集中展示了抗战期间6架美国战机坠落凉山后受到凉山人民帮助的故事。

据悉，此展览日均参观量达1500人次左右，且在国内外也引起了反响。当年的美军飞行员宋沐金·思拖在网上看到展览图片后非常兴奋，不禁想起昔日的凉山朋友。他说：“非常感谢你们举办这次展览，展出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上有我和耿、杨及苏三阔。离开凉山后，我一直没能联系上苏三阔，你们能帮我联系到她吗？如果那样，我将非常感谢。”

往返“驼峰”，6架战机落凉山

驼峰航线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在中国西南山区开辟的空中通道。这段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四川。航线全长约800公里，海拔平均在4500米到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由于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驼峰航线的开辟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壮举。中美两国飞行员克服重重困难，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围困，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4年6月至11月，共有4架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的轰炸机和两架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运输机在西康省（所辖地主要为今川西及西藏东部）境内及周边坠毁。1944年6月8日，B29轰炸机42-6314号在从印度前往成都途中在雷波上空失事；1944年6月19日，B29轰炸机42-6326号在从印度前往成都途中，由于出现机械故障，在西昌小庙机场迫降；1944年8月19日，B29轰炸机42-6425号在从印度前往成都途中，在盐源长坪子（今盐源县树河区）上空失事；1944年8月26日，B29轰炸机42-6356号在由成都返回印度机场途中，在甘洛县黑马乡上空失事；1944年9月16日，B29轰炸机42-51887号和C-109运输机坠毁于川康交界处；1944年11月20日，B29轰炸机42-10109号和C-46运输机坠毁于盐源县梅雨镇。

这几架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在于后勤供应困难。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要完成一次远程轰炸任务，就需要将B-29轰炸机弹舱改装为油箱，从印度向成都运油。一架飞机飞越驼峰航线6次，才能储备够一次战略远程轰炸日本本土及其他地区的任务用油。在这种繁忙的运输过程中，发动机超负荷运转，极易造成发动机漏油、起火等机械故障。

从天而降，“五头老鹰”和“天菩萨”带来短暂不安

抗战期间的凉山，封闭又落后，因此当6架美国战机落到凉山时，就闹了许多笑话。

1943年6月的一天，越西县大花乡彝族群众正在场坝上乘凉，突然一架美军飞机带着雷鸣声盘旋而下。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飞机，都惊恐不已，慌忙以披毡掩头奔散。其中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讲：“这是一种专门吃黄牛的五头老鹰。”人们一听说要吃牛羊的老鹰就更紧张了，连忙将田中牛羊往山上牧场赶，可是又见“老鹰”盘旋到山顶，他们又连忙将牛羊赶下山，如此被“老鹰”折腾多次后，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了。后来，盘旋多次的“老鹰”终于离去，人们才安下心来。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邓海椿告诉笔者：“解放前，彝族老乡从未见过飞机。在他们的印象中，天空中飞的就是老鹰。B-29飞机有4台发动机，1个机头，彝族百姓一看，就认为是长着5个头的老鹰。而且彝族民间故事中，上古时期有一种大老鹰可以叼黄牛。至于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彝族老乡几乎也没见过，所以很多彝族老乡见美国军人从空中乘降落伞落下时，都以为是神仙从天上来，‘天菩萨’下凡了。”

已故甘洛彝族土司、原国民革命军第27军副司令官邓锡光曾在《美机坠毁黑马溪》一文中提到：“1944年农历七月初八，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此处有误，应为第二十航空队——笔者注）的一架飞机，坠毁于今甘洛县的黑马溪落耳子厂。机上5名机组人员面临跳伞，有的降落在地上，有的挂在树梢上，但无一人受伤。当地彝人在惊吓之余跑去观看，见他们都是些黄发碧眼的人，说起话来叽里呱啦，既不像汉人，又不像彝人，误认为是天菩萨从天而降，便连连叩首，祈求保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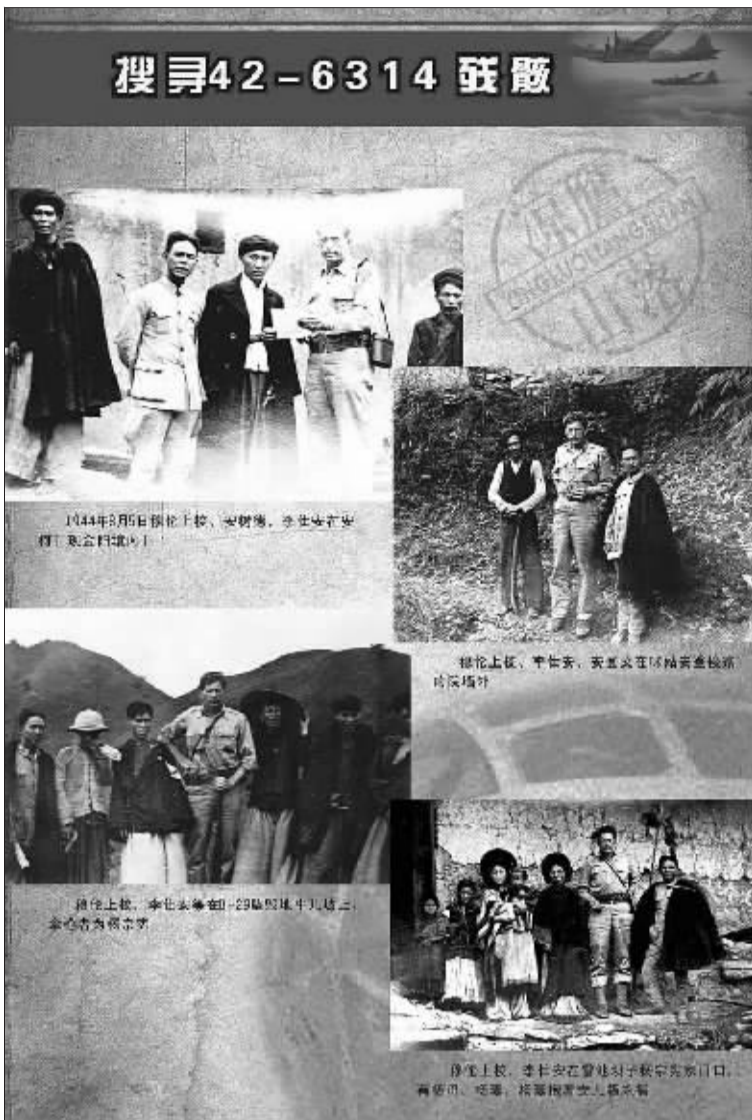
“每当航空人员打开降落伞从空中降落，他们得到的帮助有的来自华南海面的强盗和私枭，有的来自长江沿岸的游击队，有的来自各战线的国共军队，又有的是从未谋面的农民。这些救助，向来没有什么地下组织，也没有出过什么奖金赏格。这些充满惊险的遭遇，可以详细地写成一卷比任何小说都要引人入胜的书。”

——[美]克莱尔·李·陈纳德

1945年就被当时的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仓营救，安全送走了。在筹备《鹰落凉山》图片展期间，邓海椿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彝区山区调查走访，他说得比较确切：“关于在凉山彝区失事的美军飞行员被转卖为奴的谣言流传甚广，后来还被拍成《天菩萨》等影视作品。实际上，生还的美军飞行员在彝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各地开明土司和彝族头人都善待他们，不单杀牛羊照顾他们的生活，还专门派人把他们安全护送至汉区。这一点都被随后抵达的营救人员所证实。”

真诚救援，美国飞行员平安返回

6架美国战机坠落凉山，机上人员除少数遇难外，大多通过跳伞或迫降方式落在了凉山境内。当地流传甚广的是飞行员成为奴隶的故事。传说，有5名美军飞行员在盐源县跳伞后，被彝族强迫为奴，从事放羊、伐木、碾谷等工作。因身高体壮，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彝族人十分满意。这个以讹传讹的故事，惊动了美国政府。1946年10月间，美国政府派专员到凉山调查，并准备重金赎



《鹰落凉山》图片展展板之一。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供图

出这些飞行员（见1946年10月4日《新报》第3版记载）。国民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命令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与上海美军公墓清理处中校参赞费歇尔等严查，并将涉嫌的盐源黄草坪区长曹受天押解南京审讯。后经查明，盐地土司诸葛绍武因与曹受天有隙，故编造了这样的事实传播。事实是，当时降落在盐源县的3名飞行员早在

1945年就被当时的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仓营救，安全送走了。在筹备《鹰落凉山》图片展期间，邓海椿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彝区山区调查走访，他说得比较确切：“关于在凉山彝区失事的美军飞行员被转卖为奴的谣言流传甚广，后来还被拍成《天菩萨》等影视作品。实际上，生还的美军飞行员在彝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各地开明土司和彝族头人都善待他们，不单杀牛羊照顾他们的生活，还专门派人把他们安全护送至汉区。这一点都被随后抵达的营救人员所证实。”

当时的彝族群众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了救援工作。曾参与救援的彝族老人李仕安回忆说，1944年6月，美国飞虎队一架B-29轰炸机在雷波坠毁，机上11名美国人下落不明。此事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穆伦少校受美国政府委派，专程到中

国营救机组人员。国民党中央急电西昌行辕：“火速弄清情况。”西昌行辕及宁属屯垦委员会也急了，派当时的西康特（现普格县）区长李仕安连夜前往西昌，与穆伦少校会合后赶往雷波。由于交通不便，最后决定冒险走“驼峰航线”。

他们匆匆蹲在一架货机的货舱中，从西昌飞到印度，又从印度飞回昆明。到了昆明后，坐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赶到昭通。昭通到雷波不通公路，他们便雇用了10个背夫，一路艰难地向雷波进发。到雷波后，还没有上山就闻到了浓浓的焦糊味，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飞机坠毁后形成的大坑。就在他们悲叹不已时，当地土司安登文气喘吁吁地跑上山说：“机组成员都被我们救走了。”穆伦一听，就“OK，OK”地大叫了起来。

原来，当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从天而降出现在小山村时，彝族村民们吓了一大跳。经过一阵“叽里呱啦”的交谈后，尽管双方都没有听懂对方的话，但彝族村民还是把飞行员送到安登文的家中。安登文将他们奉为上宾，并端出香喷喷的牛羊肉招待他们。几天后，安登文派人把他们送出了雷波县。后来，他们取道宜宾、屏山回到了成都。

邓海椿说：“实际上，在凉山彝区获救的美军飞行员大多受到了彝族上层人士的庇护和关照，他们不但没有收取任何赎金，相反有的还给与美国飞行员重金资助。根据李仕安的回回忆录记载，失事在雷波的B29轰炸机42-6314机组幸存人员离开时，土司安登文还送给每个美军送了十两银子，开始美军都不要，不知值多少钱，后来，他们把银子当做纪念品收下了。”

【思考】

林耀华对彝族的认识，是通过穿行于汉彝之间的“中间人”展开的。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林耀华似乎一直在寻找某种能够真正沟通汉彝文化的中介物，无论是汉家、彝家的礼俗，西方传入的学校教育，还是土洋兼有的礼物。彝汉“文化隔阂”如此根深蒂固，或许与双方之间缺乏一些真正有共同文明基础的中介物或者说“盟约物”息息相关。林耀华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对此存有困惑和反思，是不是暗示着这样一些文明的基础仍然缺失呢？

“中间人”，认识彝族的中介

——《凉山夷家》的启迪之二

□ 罗杨

各具特色的“中间人”

林耀华对所谓“夷人”的了解，是通过某种意义上的“中间人”展开的。纵观他的田野调查，普通“白彝”百姓或纯粹定居村里的“黑彝”，似乎仅是林耀华做体质测量的“标本”。真正和他打交道、形成他对彝族人个性印象和好恶感情的，是引领他穿行于彝区、汉区之间的彝族保头们。所谓“保头”，即一些“黑彝”头人。林耀华曾回忆说：“当时的凉山夷区是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境内有一百多个各自为政的黑彝家支，你的保头只能在其家支的势力范围内保证你的安全。在那些与你的保头有世仇的家支所控制的地域内，甚至连你的保头本身的安全也成为问题。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保头是会通过转保或者其他办法来避免这种危险的。”

但中间层的各色人物并非千篇一律。负责林耀华凉山之行的共有3位保头，他们彼此是亲戚。里区达吉为主要保头，老穆是达吉的族侄，哲觉是老穆的舅舅。在一路的交往中，林耀华对3位保头的感情差别极其分明：达吉似乎是“好夷人”的代表，让林耀华由衷感到一种“真诚的友谊”；哲觉是“坏夷人”的典型，让林耀华一路担惊受怕；老穆多数时候是沉默，林耀华对他的感情可谓中立。如果从与汉族的关系来考察，这3位保头也对应地表现出与汉族关系的亲疏。通过林耀华与这3位保头之间的故事，可以窥见彝汉关系的复杂多样，以及林耀华的矛盾心态。

“喝酒”与“行礼”盟誓

林耀华与达吉正式“建交”始于一场仪式。那是在1943年的8月20日，由雷波县长李开第在县政府主持简单仪式，由双方当事人到场行礼，然后入山。

这场改良的仪式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核心问题：彝汉之间的信任，或者说和平的“盟约”究竟该如何建立？建立的基础应是什么？在林耀华看来，彝族人喝酒盟誓那套规矩，只能约束彝族人，这套规矩一旦跨越文化的边界就失效了，反而成为彝族利用汉族的手段，因此，这不是彝汉双方建立互信的有效方式。依照汉族礼节，比如“行礼”，是否可以成为双方“缔约”的有力约束呢？从林耀华后来的举动看，其实也不是。林耀华行礼后，又特意写了两封快信，“一封寄重庆内子饶毓苏，一封寄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兄，通告他们入山日程、黑彝保头的支系姓名、办理夷务的介绍人等等，以防意外事变的发生。”

同时，仪式改良本身也反映出当事人微妙的心态变迁。“喝酒”建立的是兄弟或亲戚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往往暗含着辈分等级差别。“行礼”双方却是平等的，但这种“貌似”平等很脆弱，它没有一种双方都完全认可的文化或权力约束保障。如果林耀华凭借的是象征性的国家政权或与彝族同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汉族，那么这两者对于达吉都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他心里向往的甚至还是以前的“皇帝”，“一品大员”（这一点从他家房屋张贴的对联可看出）。所以，不管盟誓的细节如何改良，如果汉彝之间没有真正找到一个双方真心诚服的“约”，那么，林耀华此行的猜疑、隔阂、担忧的情绪依然会在后来者身上重复。

行程中，达吉琢磨不定也琢磨不透。林耀华不知道他会突然在哪里消失，隔一段时间又会在哪里早早地等待着与自己会合。达吉的去留固然与当地彝族家支势力的分布相关，但这给林耀华一种印象：达吉自己的行踪飘忽不定，对考察团的行程却了若指掌，这种对比反而显出他运筹帷幄的能力。

林耀华不懂彝语，达吉夫妇谈话时，只见达吉“虽闭目，却亦静听，不时发言，类似安慰，又似批评”，但始终不明白他到底在表达什么。林耀华后来回忆说：“‘文革’期间，他（达吉）受到了冲击。据说，他对于自己在这期间一共挨了多少次批斗是计数得十分清楚的。至于他为什么要计数这种痛苦，没有人能知道。这个达吉，总是让人琢磨不透。50年前他曾帮助过我理解凉山夷家，但对于他怎样理解我们汉人，我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人类学家的任务本来就是理解人，可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达吉和我们自己，这却仍是个问题。今天想到这些，我心里仍不免有一种难言的迷惘和惆怅。”

“学校”可能创造汉彝友好关系

对于保头老穆，林耀华着重记述了“办学”一事：“有一次老穆带我到他的住屋坡下，勘察地形……老穆问我此地可否盖一所小学，并问政府能否来此兴办教育事宜。”

如果之前和达吉是通过“行礼”来缔结一种“盟约”，“学校”则是林耀华发现的另一个可能创造汉彝友好关系的中介物。他如此欣喜，因为“办学”这一意向的多重象征恰与他作为一个“中间”知识分子的心态相符合；它与传统中国文明中心向四周输出教化的情调相符合；教化的内容可置换成西方传入的当时被奉为最先进的现代知识，这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相符。但问题是，办学的“行使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中？从当时彝区的情况看，国民政府开办的几所学校都因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而停办，只有彝族土司岭光办的小学得以维持。这无论对林耀华还有后来者都应颇有启示。

哲觉，为人粗暴却很尽职的“野蛮人”

保头哲觉，在林耀华笔下几乎汇集了各种“野蛮人”的特征。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一种“不文明”的喧嚣中开始的。林耀华回忆说，哲觉“一进屋即滔滔不绝地喊叫，……开口就要求我们杀羊招待，带骂带闹地喊了半天。晚上睡在我们隔壁，整夜说话，闹到天明”。

事隔多年之后，对这位当时最令自己厌恶的保头，林耀华的歉疚、反思之情却最多。他说：“哲觉虽然为人粗暴，但也很尽职。他不仅要保证我们的安全，还要负责安排我们的食宿。……他辛苦了一路后却不能兑现应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恼火，其实是应该理解也可以理解的。”他甚至反躬自问：“自己当时凭什么把他看成贪得无厌的人呢？如果家乡人提出类似要求，我会这样想吗？”

与普通彝家的“约”或“换”

除了3位保头，林耀华沿途免不了要在彝族人家中吃住歇脚。如果与达吉、老穆是以行礼、办学等作为沟通汉彝的中介，他与这些彝乡人家也存在一种潜在的“约”或“换”的关系；彝族人留他吃住，杀鸡宰羊，他给主人家“礼物”以报偿。这些用来打开“双边”关系的礼物是什么呢？林耀华说：“我们赠主妇剪刀丝线等，狂喜大呼。”

林耀华置办的礼物都是给人家的，给老穆的父亲送的也是“布、镜子、剪刀、丝线”等等。有的礼物对彝族人来说并没有实际用途，他们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如徽徽。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礼物呢？林耀华在《凉山彝家的巨变》中说：“三河以打山后遇见樵夫老妻一对夫妇，老者系一胡姓汉娃，在夷地已四十余年，其妇于二十余年前在海脑坝被掳到凉山，家主为之婚配。同行有两个别家女娃子，一系第二代汉娃，一系第三代汉娃。考察团分赠各人针线，老人手指第三代女娃对作者云：‘此女已是蛮子，可不必给她。’”

【影像春秋】

抗日战争中的少数民族



影像四：朝鲜族抗联战士的家人

照片中站立着的长者叫朴顺单，朝鲜族，1921年出生于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琿春县三安村。她的父亲曾是抗联指导员。小时候，朴顺单随父亲到了汪清县三道

河子村，在家人的影响下，年幼的她经常给中共汪清县委和抗联传递情报。长大以后，朴顺单选择嫁给一位抗联战士。她手中的照片就是她丈夫的生前留影。（光远）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各族儿女奋起反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朝鲜族战士和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兄弟民族的战士一起出生入死，他们用鲜血结下的阶级、兄弟、同胞、乡亲友谊，比任何情感和友谊都深厚。

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陈列的60多位抗日将领和著名烈士名录中，留下了许亨植、李红光、李学福、李敬媛、李福林、李龙云、李锦萍、李一平、李凤善、安顺福、徐凤山、金正国、金根、韩浩、韩震、权永碧、朴振宇、朴翰宗、朴先锋、柳万熙、赵

吴善等朝鲜族烈士的英名。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族战士占了绝大多数，第一、七军中朝鲜族战士也约占半数。当时，每3至5名抗联战士中，就有1名朝鲜族战士。据文献记载，整个东北地区约有6万名朝鲜族青壮年后从军，而牺牲者达半数之多。

1986年8月，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参观时，抚今追昔，感慨良多，遂题诗一首：“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红心振双翼，延边正起飞。”（李水山）